政大史粹第十五期
2008年12月，頁153-178

大躍進與中蘇關係的詮釋

王瑞婷*

本文探討大躍進與中蘇分歧研究的三種解釋。第一種解釋，「意識型態衝突論」說明毛澤東對於大躍進的獨特思維，牽動蘇聯的敏感神經。然而沒有充分的證據說明蘇聯的反應。第二種解釋「金門事件分歧說」認為金門事件的用意在於輸出大躍進的緊張，進而衝擊蘇共二十大的三和路線。從時間上來看，大躍進發動時，國內的氣氛是樂觀的，因此沒有緊張的氣氛需要輸出。大躍進與金門事件的關係需要更新的探討。第三種解釋則從毛澤東的認知著眼，中蘇的紛歧是因為毛澤東期待蘇聯的支持，而這種期待又在廬山會議落空，造成中共經濟再一次躍進。本文首

*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C.E.P.S.

先說明這三種解釋的內容。其次分析這些解釋的適用性。最後本文將指出，長期主導美國學界的「中國研究典範」對於中蘇分歧的解釋，需要更進一步的釐清與探討。

關鍵字：中蘇分歧、大躍進、毛澤東

C.E.P.S.

一、 前言

1958 年對於中共的內政與外交而言，都有特別的意義。這一年，毛澤東以極度樂觀的思維發動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力圖「向共產主義過渡」。同時，金門危機與聯合艦隊等事件，中蘇關係逐漸出現裂痕。毛澤東自己也講過，1958 年是中蘇關係的轉折點，原因在於「蘇聯想控制我們」。[1]

中蘇分歧的原因可否簡單歸納爲蘇共對中共的老子黨心態？中共中央的觀點是，自蘇共二十大以來，蘇聯領導人提出並執行一條修正主義路線，引起中蘇分歧。[2]蘇聯共產黨的觀點是，中共領導人推行教條主義，反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蓄意破壞蘇中關係，引起社會主義陣營的分裂。[3]

這兩種解釋，主要是政治性的，目的在於突顯對方的責任，而非歷史的真相。[4]本文認爲，中蘇分歧的原因，除了考察兩國互動產生的摩擦，

---

[1] 李越然，《中蘇外交親歷記》（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190。

[2] 人民出版社編，《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55-63。

[3] 羅平漢，《文革前夜的中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48-149。

[4] Zagoria認為中蘇分歧緣起於蘇共二十大，之後的美國研究幾乎都接受他的論點。現在的研究說明，中蘇之間的原則性分歧並非產生在蘇共二十大。波匈事件發生後，赫魯雪夫請中國參與對歐洲事務的處理，中蘇合作日趨密切。在1957年蘇共中央六月全會清除「莫洛托夫反黨集團」的問題上，毛澤東迅速表態支持赫魯雪夫，赫魯雪夫也以10月15日「國防新技術協定」的簽訂作為回報。關於「國防新技術協定」的簽定對中蘇關係的影響，參見楊奎松，《走向破裂：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香港：三聯書店，1999），388-392。

C.E.P.S.

也要觀察內政發展所帶來外交關係的變化。例如，中蘇分歧（1958-1960）的三年間，大躍進和中蘇關係的逐漸破裂有什麼樣的關係？純粹是時間點上的巧合，亦或兩者之間存在某種關連？如果這種關連確實存在，是如何形成的？又如何影響中蘇關係？

意識型態與國家利益在這個過程中如何起作用？對於中蘇關係的走向是正面或是負面的？過去的研究如何看待這個問題？讀者能從過去的文獻爭辯中得到什麼樣的啓發？

參考 1962 年 Zagoria 的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5]到 2007 年沈志華主編的《中蘇關係史綱》[6]這 45 年的研究，本文整理出三種關於大躍進與中蘇分歧論述的解釋。第一個解釋和第二個解釋的核心，在於論證「大躍進分歧說」，即大躍進不只是挑戰蘇聯模式的經濟策略，政治方面也挑戰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地位，意識型態上則是和蘇聯搶奪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詮釋權。一言以敝之，大躍進對於中蘇分歧有關鍵的影響力。

第一個解釋所採取的分析概念，立足於社會主義國家最重要的特徵，就是意識型態。[7]本文將第一個解釋稱爲「意識型態衝突論」，其認爲大

---

[5] Donald Zagoria,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1956-1961*(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2）.

[6] 沈志華主編，《中蘇關係史綱》（北京：新華書店，2007）。

[7] 在中蘇關係的問題上，有兩種很有趣的分析。第一種分析認為中蘇關係不會輕易分裂，原因是共同的意識型態與革命理想。例如Zagoria就是抱持這種看法。Zagoria對中蘇關係預期的失準，可以參考Treadgold W. Donald的分析。Donald Treadgold, “Alternative Western View Of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in Ellison Herbert eds.*The Sino-Soviet Conflict*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1982), 326.而後中蘇關係漸行漸遠，意識型態衝突又成為非

躍進表面上看來是國內經濟政策的調整，牽涉到外交關係，理由在於經濟模式背後的意識型態。這個解釋在 60 到 70 年代的美國學界十分流行。

第二種解釋，相當程度吸收了意識型態衝突論的觀點。主要由外交與國際關係領域學者所採用。這一種解釋強調內政上的「激進」會在外交決策上造成「類似的擺盪」。這一個解釋的特色，是將大躍進與 1958 年金門危機連結。Hinton[8]與 Robinson[9]都以國際關係理論中「邊緣策略」解讀金門危機。順著這個理路，中蘇分歧因爲當時蘇聯和美國正在進行和解，金門事件破壞了蘇共二十大以來實行的「三和路線」。本文試圖指出，這種論證方式，大躍進實則屬於「前置變項」。80 年代之後，金門事件與大躍進的關聯逐漸受到新的檢視。

80 年代以來，中蘇分歧研究開始了解釋轉移的過程。美國學界對於中共外交研究開始採取新的途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就是 China under threat。Melvin Gurtov 認爲過去對於中共外交的研究忽略其國內因素。所謂的外交政策應該是國內政治、制度以及價值的延伸。[10]由於中共改革開放以及蘇聯的解體，導致大量檔案的解密。相對寬鬆的政治氣氛，也利於

常重要的立論核心。

[8] Harold Hinton , *Chinese Policymaking Under Soviet Pressure* (Washington D.C: Standford University, 1971), 13. Harold Hinton, *China's Turbulent Quest*(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1972), 94.

[9] Thomas Robinso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rom The 1940s To The 1990s,"in Thomas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 ed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556.

[10] Melvin Gurtov, *China under threat : the politics of strategy and diplomacy* (Baltimore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1-24.

C.E.P.S.

相關回憶錄的出版。90 年代以來，中共有許多引人注目的研究，構成第三種解釋的主要內容，和第二種解釋類似，強調內政和外交關係密切的特點，和第二種解釋最大的區別，不借用國際關係理論描述「內政－外交」的連鎖過程，而是透過毛澤東的認知。本文將第三個解釋概括爲「毛澤東認知論」，毛澤東對於國內情勢的理解影響他對國際局勢的判斷，進一步影響外交政策的產出。這一個解釋暫時擱置意識型態的分析方法，著重毛澤東在大躍進期間和蘇聯的互動，旨在呈現這三年中共政治的具體過程。

第三種解釋針對「大躍進分歧說」，看法分歧。開始有學者對於大躍進對於中蘇關係的傷害持保留態度，例如徐天新談及一九五八到一九五九年的中蘇關係，隻字未提大躍進。除了檢討大躍進對於中蘇關係的影響，中蘇分歧這一段過程，其他的解釋慢慢浮上檯面。楊奎松認爲毛發動大躍進的心態過於自大，「我們過渡到蘇聯人面前，他臉上無光」。楊認爲一九五九年十月雙方會談的不順利，從根本上惡化了中蘇關係。[11]這次會談的紀錄，過去並無公開，從相關回憶錄得到的資料，大致可以了解這次會談總結雙方重大分歧，大致有以下數項，中印邊境衝突、西藏叛亂事件、金門危機、美國俘虜釋放問題。這些事件說明中蘇關係這三年間所牽涉的不只是意識型態衝突，還有國家利益，以及冷戰結構下兩國對美政策問題。

第三個解釋的分析概念「毛澤東中心論」是很鮮明的。本文同意從毛澤東中心論的角度研究此一時期的中蘇關係，並且反駁毛澤東在外交上受到牽制的論點。本文首先介紹這三種解釋的主要論點。其次，分析這些解

[11]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416-422。

C.E.P.S.

釋的詮釋問題。結論將指出，美國觀點下的「中國研究典範」對於中共外交研究的適用性，仍待更進一步的釐清與研究。

二、 意識型態衝突論

從中蘇分歧到中蘇分裂的過程中，一般著作較常提及的意識型態衝突，多半是 1956 年蘇共二十大提出三和路線中的「和平過渡」，與毛澤東「東風壓倒西風」的衝突，這個問題在莫斯科會議得到暫時的妥協。以及 1960 年在人民日報「列寧主義萬歲」三篇文章引發的理論衝突。當然，還有 1964 年中共中央以「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的名義發表「九評」，正式開啓兩黨公開論戰。[12]對於大躍進「本身」引起的意識型態衝突，研究相對較少。

意識型態衝突論的解釋，至今仍發揮影響力。例如「新修正主義」的代表 Gaddis John Lewis，在討論大躍進對於中蘇關係的影響之時，認爲「自由價格體系」衝擊中蘇關係的論點。[13]台灣的相關著作，大都支持發展模式差導致中蘇分歧的論點。例如陳永發將中蘇分裂的解釋置入大躍進一章的脈絡。陳認爲中蘇分裂的原因是兩國的民族主義、國家利益、對於世界局勢的看法以及朝社會主義過渡方法的差異。[14]陳的論點可以概括爲下面

---

[12] 羅漢平，《文革前夜的中國》，94-168。

[13] 在Gaddis John Lewis的研究裡，也沒有把「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做出概念上的區分。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215.

[14]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台北：聯經，2001），759。

C.E.P.S.

一段話：

> 一九五八年毛澤東提出超英趕美的號召，基本上就是對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經驗的批評和挑戰，顯示中共決心另外走出一條自己的路。不論主觀上毛澤東是如何想的，他決定採取大躍進的總路線，實行人民公社，便是對蘇聯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霸權地位提出公開挑戰。[15]

陳永發明確指出大躍進之所以引起中蘇分歧，是因爲中共挑戰蘇聯模式，不過陳未分析「毛澤東的主觀意圖」。讀者不能確定這種分歧是透過什麼樣的機制形成的。和陳永發觀點類似，關向光認爲「中共改變經濟發展模式爲大躍進，蘇聯也持否定態度。1959 年 1 月，蘇共二十一大批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凡此，皆使中蘇共關係面臨決裂。」關不否認大躍進對中蘇關係的傷害，可惜的是關未進一步分析原因。[16]兩位台灣學者的分析，都同意發展模式的差異導致外交關係的分歧，然而沒有交代這種分歧的過程是如何進行的。

在中蘇全面分裂之前，美國就對中蘇關係開始著書立說。美國學界早期的分析，著重中共與蘇聯意識型態的差異。大體而言，60 和 70 年代的研究屬於「意識型態主導期」。「意識型態衝突論」於是成爲中蘇分歧最流行的解釋。這一派論點強調毛澤東獨特的意識型態及其對於國內發展的判斷。學者引用的原始材料主要是毛澤東的〈矛盾論〉、〈不斷革命論〉

---

[15]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761。

[16] 關向光，〈論中共大躍進時期的毛澤東路線〉（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1996），204-205。

或是〈論十大關係〉。從 1961 年 Brzezinski 的 *The Soviet Bloc* [17]以及 1962 年 Zagoria 出版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18]、1966 年 Schurmann 的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19]，再到 1977 年 Meisner 的《毛澤東的中國及後毛澤東的中國—人民共和國史》[20]，奠定意識型態在中蘇關係研究的地位。透過意識型態，發展模式的差異和外交關係的摩擦在論述上得以連結。面對蘇聯模式產生重工輕農、城鄉發展不均的問題，毛澤東產生他對於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獨特看法，大躍進就是針對蘇聯模式的調整。乍看之下，這是中共經濟策略的調整，然而大躍進背後隱含的意識型態挑戰，例如暗示中共會比蘇聯更早進入共產主義階段，使得中蘇關係日漸惡化。這個分析經常看到的關鍵字，就是中共的「激進」和蘇聯「漸進」的對抗。

舒曼的觀點，開啓了美國對於中共意識型態研究的大門。在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這本經典之作，舒曼的分析指出：蘇聯認爲理論的改變牽涉到權力。史達林過世之後，沒有人有足夠的權威可以改變理論。可是對於中共而言，蘇聯的適當角色，是保持理論的「神聖化」，其他國家的共產黨則保有「實踐的」意識型態。[21]

---

[17]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Soviet Bloc* (New York: Frederick A.Peaeger, 1961)

[18] Donald Zagoria,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1956-1961*.

[19] 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20] 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著，杜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香港：中文大學，2005）。

[21] 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35. 舒曼將中共的意識型態區分為「純粹」與「實踐」的意識型態，他認為大躍進

舒曼主要指出理論和權力之間的關係，對於大躍進期間中蘇互動的分析較爲簡略。Meisner 繼承了舒曼關於矛盾論、論十大關係、論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分析，同時提供較爲詳盡的歷史細節。Meisner 明確指出大躍進對於中蘇關係的惡化。參考「大躍進的思想根源」一章，作者提供了若干線索。大躍進的產生，是因爲毛澤東對於中共實行「蘇聯式的現代化途徑」所產生的政治經濟後果存有懷疑，因此在毛澤東「唯意志論」與「不斷革命論」的意識型態驅使下，尋求另一種解放生產力的替代性政治經濟制度，藉以擺脫「史達林」模式對中共政經發展形成的制約。[22]1981 年 Jacobsen 認爲大躍進暗示有比蘇聯更快邁入共產主義的途徑，「走另外一條路」挑戰了蘇聯的霸權地位，這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23]

三、 金門危機分歧說

「意識型態衝突論」這個解釋的重大缺點之一，暗示大躍進的出台即

強調「純粹」意識型態的宣傳，若沒有這種「苦幹三年進入共產主義天堂」的遠景號召，無法動員群眾。[21]大躍進的發生是因為毛澤東想要解決以下三種矛盾：經濟發展城鄉不均的矛盾，政治上官僚主義與脫離群眾的矛盾，社會上階級鬥爭仍然存在的矛盾。

[22] 邁斯納認為大躍進留下兩個苦澀的遺產，第一是農民和共產黨之間的信任蕩然無存。第二則是加速中蘇聯盟的破裂，使中國在國內經濟危機的情況下又面臨一個日益險惡的外部國際環境。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著，杜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79-188。

[23] C.G Jacobsen, *Sino-Soviet Relations Since Mao* (New York: Praeger, 1981), 52-53.

註定中蘇分歧。這種說法，除非有堅強的證據，否則很難令人信服。為了更具體呈現 1958 年中蘇分歧的過程，補充「意識型態衝突論」解釋的不足，某些學者將金門事件與大躍進產生分析上的連結。

第二種解釋，本文稱之為「金門事件分歧說」。這一派解釋大致接受意識型態衝突論的核心內容。比較簡略的分析指出，外交受到內政的激進影響。John Gitting 指出這種傾向主要在雙百運動之後出現。[24]Hinton 認為「毛主義的激進影響同時在中共的外交以及內政方面起作用，特別是在中蘇關係上，影響深遠與戲劇性。例如蘇聯對於大躍進的指責。」[25]Robinson 指出，毛引導的國內政治循環在中國外交政策引發類似的擺動。毛澤東的意識型態時常將政策推向一個極端，或是延遲改變，端看當時的國內需要。然而這幾位作者沒有提供相關的證據，也無法說服讀者這個「過程、擺盪、循環」是如何造成的。

這一派解釋中比較詳細的分析，則是從國際關係理論取材，解釋大躍進與金門危機的關連，論證金門危機對於中蘇關係的傷害。國際衝突理論有以下的說法「面臨國內日漸昇級的動亂與騷動，任何時代的統治者都會使用挑起對外戰爭的方法來轉嫁矛盾」，這就是「邊緣策略」的主要內容。[26]Hinton 用這種理論說明大躍進和金門事件的關係。中共外交政策結合了

---

[24] John Gitting, *Survey Of The Sino-Soviet Dispute 1963-1967*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1968), 93.

[25] Harold Hinton , “China As An Asia Power ,” in Thomas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 eds. *Chinese Foreign Policy*(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4), 367.

[26] 詹姆斯多爾蒂、小羅伯特普珐爾次格拉夫著，閻學通、陳寒溪等譯，《爭辯中的國際關係理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283。

C.E.P.S.

民族主義和意識型態，中共利用強烈的民族主義宣傳，對群眾作政治動員，目的是打擊國外的「負面範例」，在這個過程，國內的緊張向國外輸出，政權的緊張得以暫時舒緩。

> 金門事件是藉由測試國民黨與美國之間的友誼。北京意圖將國內的巨大壓力（大躍進）轉往解放台灣，以及促使赫魯雪夫採取更明確的反美立場。[27]

因此，Hinton 的推理如下：大躍進發動時，國內的氣氛是激進的，金門事件的發生是要舒緩當時國內因為推動大躍進的緊張氣氛，炮擊金門又挑戰蘇聯和美國和解的立場，以及赫魯雪夫正在貫徹的三和路線。毛澤東此時的行動，讓赫魯雪夫擔心和美國的關係。中蘇關係因而走向分歧。

這一派分析裡，「簡略版」的主要立論「外交受到內政激進的影響」，缺乏相關的證據與詳細的分析。「詳細版」的問題則是理論與史實之間的落差。在 Hinton 的推理下，大躍進並非是導致中蘇分歧的直接原因，真正的導火線是金門事件。大躍進在這一派解釋中不過是要證明外交受到內政的激進影響。大躍進變成「前置變項」：先有了大躍進的激進，才有金門危機的發生，也才能衝擊中蘇關係。按照這樣的推理，如果大躍進成功了，沒有緊張需要輸出，金門事件就無法發生？歷史不是這樣簡單的。

除了上述的推理問題，金門事件和大躍進的關係仍啓人疑竇。金門事件的發生是否在於緩解大躍進的壓力？根據邊緣策略理論，這種國內的「緊張」是一種「可能導致政權危機的狀態」，因此，才需要將國內的注

[27] Harold Hinton, *Chinese Policymaking Under Soviet Pressure,* 13.

C.E.P.S.

意力「輸出國外」，使國外的敵人成爲「代罪羔羊」。[28]從時間點上，金門事件發動之時（也就是 1958 年的夏季），大躍進正在濃厚的樂觀主義當中，當時的中共的領導人沒有預想到會造成嚴重的國民經濟問題。因此，「不可能是爲了轉移國內壓力」。[29]

雖然有以上的分析問題，並不代表大躍進和金門事件之間完全沒有關聯，也不表示金門事件對於中蘇關係沒有衝擊。只是說明邊緣策略理論的解釋有限。當然，沒有任何一種理論能夠解釋歷史事件的所有面向。仍有學者認爲大躍進和金門事件有關聯，陳兼指出，金門事件可以將大躍進需要的「超常動員」合理化。他引用了毛澤東「緊張局勢有利無害」的論調。因爲金門事件製造的緊張，可以更合理動員國內的人力。[30]陳兼的論點缺乏詳盡的證據。單憑「緊張局勢有利無害」一段文字，不能證明金門事件的發動是在於「合理化群眾動員」。無論如何，陳兼也不是支持「邊緣策略」。

---

[28] 林碧炤，《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台北：五南書局，1996），387。

[29] 關於毛澤東發動大躍進時「頭腦發熱」的樂觀心理，有許多一手回憶錄可以證實，例如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北京：春秋出版社； 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薄一波著，《若干重大事件與決策的回顧》，上、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1993）。關於金門事件與大躍進的關聯，可以參考關向光，〈中共黨史導讀〉，收入李英明、關向光編，《中國研究的多元思考》（台北：巨流，2007），39-41。

[30] 陳兼，〈革命與危機的年代〉，收入楊奎松主編，《冷戰時期的中國對外關係》（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100。

C.E.P.S.

四、 解釋的競爭與轉移

在 *China under threat* 一書中，作者呼籲美國學界的中共外交研究必須採取新的研究途徑，也就是內政的角度分析外交政策的變化。[31]80 年代以來，隨著中共資料以及檔案的開放，[32]以及 90 年代冷戰的結束，中蘇分歧的研究逐漸在個別事件以及整體詮釋方面有了新的突破。80 年代之前，美國學界對於中蘇分歧的研究一枝獨秀。改革開放後，中共急起直追，專注於中蘇分歧的原因、過程與結果。楊奎松、沈志華、李丹慧、牛軍、陳兼等人的研究十分引人注目，構成第三種解釋的主要內容。

中蘇分歧的新解釋，暫時拋開意識型態以及國際關係理論的方法，著重這三年中共政治的具體微觀發展。首先，第三個解釋對於「大躍進分歧說」，見解紛紜。沈志華參考解密檔案，認爲蘇聯對待大躍進跟人民公社的態度不同，兩者必須有概念上的區分，真正令蘇聯感到不安的是人民公社。1958 年蘇聯沒有針對大躍進或是人民公社口誅筆伐，直到中蘇論戰爆發後，雙方才針對大躍進與人民公社的問題「進行攻防」。

> 在後人的一般印象中，好像蘇聯對中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從來就是持反對立場的。其實不然。首先，對於「大躍進」運動，

---

[31] Melvin Gurtov, *China under threat : the politics of strategy and diplomacy,* 1-24.

[32] 關於中共檔案開放的時間點，依據楊奎松的記載，應該是在八十年代中後期。開放的檔案涉及毛澤東與莫斯科之間的電報、指示與談話錄。九十年代之後，蘇聯檔案也大量開放。參考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

> 蘇聯開始熱情支持和贊揚，後來逐漸冷靜下來。其次，對於人民公社，蘇聯開始表現出極大興趣，接著一直保持沉默。最後，總體上說，蘇聯下層社會表現比較積極，上層領導則始終保持謹慎態度。而蘇聯真正公開表示反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是中蘇之間爆發大論戰以後的事情。就「大躍進」運動而言，從當時蘇聯社會層面的反應看，基本上是熱情支持的，報刊上也是一片贊揚聲。同時，對中國宣傳的一些具體經濟指標，很多人持懷疑態度。[33]

也有學者對於大躍進對於中蘇關係的傷害持保留態度，例如徐天新談及 1958 到 1959 年的中蘇關係，隻字未提大躍進。他認爲真正有影響的是聯合艦隊、長波電台以及砲擊金門等事件。[34]也有學者認爲大躍進對於中蘇關係的影響要從大躍進的成敗與否來觀察。牛軍指出，廬山會議之後，中蘇關係確實走向危機，然而到了 1960 年代，面臨大躍進的糧食短缺問題，中共開始改善中蘇關係，1961 年中蘇兩國關係依舊保持友好，雖然這種緩解的趨勢顯得十分脆弱。

> 大躍進的成敗及可能引起的政治後果，最終決定中國這一時期對外政策走向的首要因素，當時對外政策的調整的程度並不足以大致消除導致對外政策動盪的根源。[35]

---

[33] 沈志華，〈蘇聯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反應及其結果──關於中蘇分裂緣起的進一步思考〉，《二十一世紀》網路版，12（2003.3）。

[34] 徐天新，〈論一九五八到一九五九年的中蘇關係〉，收入牛大勇、沈志華主編，《冷戰與中國的周邊關係》（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266-280。

[35] 牛軍，〈中國外交的革命化進程〉，收入楊奎松主編，《冷戰時期的中國

從牛軍的論點可以看出，並非大躍進的出台就決定中蘇分歧的必然結局。牛軍認爲，中國「對外政策左轉的前夜」是在 1962 年，不是在大躍進推行之時。[36]

第三個解釋也致力於描繪大躍進期間中蘇分歧的具體圖像。沈志華的分析是「毛澤東從耐心企盼到憤怒出擊」。毛澤東希望蘇聯能毫無保留的支持大躍進，然而當赫魯雪夫批評人民公社的談話送上廬山，原本「糾左」的風向轉爲「反右」。說毛澤東是「小資產階級」的彭德懷被懷疑「和蘇聯勾結」，最後被打成「反黨集團」。[37]楊奎松在利用蘇聯的解密檔案，認爲蘇聯雖然批評大躍進，然而大躍進對於中蘇關係的破壞主要是在廬山會議之後。而且，毛發動大躍進的心態過於自大，「我們過渡到蘇聯人面前，他臉上無光」。楊認爲一九五九年十月雙方會談的不順利，從根本上惡化了中蘇關係。[38]從相關回憶錄得到的資料，大致可以了解這次會談總結雙方重大分歧，大致有以下數項，中印邊境衝突、西藏叛亂事件、金門危機、美國俘虜釋放問題。這些事件說明中蘇關係這三年間所牽涉的不只是意識型態衝突，還有國家利益，以及冷戰結構下兩國對美政策問題。新解釋的中蘇分歧研究不再侷限於大躍進的時間範圍，甚至包括蘇共二十大後中蘇對於史達林的評價問題、波匈事件中共的穿針引線、國防新技術協

對外關係》（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122-128。

[36]牛軍，〈中國外交的革命化進程〉，收入楊奎松主編，《冷戰時期的中國對外關係》，122-128。

[37] 沈志華，〈試論中蘇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兼談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結構性弊病〉，《中國冷戰網》，2007年10月22日。

[38]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416-422。

C.E.P.S.

定的簽署等等。

第三種解釋的特色，突顯毛澤東的心態與認知。以下所舉的三個例子，都是毛澤東從國內的角度出發，引發外交的變化。毛澤東期待蘇聯能夠毫無保留的支持大躍進，這種期待卻落空。金門危機上，蘇聯的援助口惠實不至。長波電台與聯合艦隊對於中共是有利的，毛澤東卻「小題大作」，將問題上綱到「侵害中國主權」。1959 年 10 月的爭吵，在毛澤東看來，蘇聯和「帝國主義走得是越來越近了」。正如李丹慧所言，「1954 年到 1960 年中蘇關係由親密向分裂的發展變化，主要由毛澤東和赫魯雪夫以及中蘇兩黨從本國立場和利益出發，對各自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估計以及對對方探索方式的認識相聯繫。」[39]

第三個解釋的前提，是毛澤東中心論。即毛澤東主導了外交關係。這個前提能否成立？大躍進時期的高層決策研究，在泰偉斯（Frederick C. Teiwes）、孫萬國（Sun Warren）[40]、陳仲禮（Alfred L. Chan）[41]的努力下，「毛澤東中心論」已逐漸確立。若毛澤東獨攬經濟大權，沒有理由認爲他會在外交上大權旁落。或許有人會用周恩來的角色來質疑毛澤東在外交上「一手抓」的論點，然而有兩件事可作爲反證，第一，毛澤東在 1958 年撤換

[39] 李丹慧，〈毛澤東對蘇認識與中蘇關係的演變〉收入李丹慧編，《北京與莫斯科：從聯盟走向對抗》（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329。

[40] Frederick C. Teiwes and Sun Warren, *China's Road to Disaste : Mao, Central Politician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Unfold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5-1959*(Armonk, N.Y.: M.E. Sharpe, 1999).

[41] Chan, Alfred L. *Mao's Crusades: Politics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China's Great Leap Forwar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C.E.P.S.

周恩來外交部長的職務，以軍人出身的陳毅代替。第二，當王稼祥在 1962 年提出要跟蘇聯修復關係時，毛澤東批評王是「三和一少」。這兩點決策都沒有引起黨內的反抗或鬥爭。

五、 結論

本文檢視關於大躍進與中蘇分歧研究的三種解釋，探討其中史實與理論問題。「意識型態衝突論」主要由美國視角建構，強調毛澤東思想的獨特性。然而只有意識型態上的差距，不能具體說明這三年間雙方的拉鋸過程。分析者或許限於檔案的開放，往往缺乏對於蘇聯反應的細緻分析，導致推論與證據無法結合的情形。這種解釋暗示，大躍進的發生即註定中蘇分歧，忽略了這三年兩國互動的具體過程。從現在的研究來看，1958 到 1960 之間乃是中蘇關係拉鋸的時刻。政治宣傳上，60 年代初期的紅旗雜誌仍舊高舉中蘇友好的旗幟，表示歷史發展不是這樣簡單的。[42]

「金門事件分歧說」，強調大躍進的激進特質，金門事件輸出大躍進的緊張，因此挑戰了蘇聯的「三和路線」。本文試圖從時間點論證邊緣策略的侷限性。毛澤東發動金門砲擊需要新的視角解讀，例如從中美關係的脈絡去考慮。從後來的發展來看，中美恢復大使級會談中提及台灣問題，說明毛澤東發動砲擊時考慮的「理性因素」。毛澤東的動機很可能同時在測試蘇聯對中共的支持，以及美國援蔣的程度。後來的事實說明，蘇聯對

[42] 李巧寧，〈「中蘇友好話語」的構建：1949年—1960年〉，《當代中國研究》網路版，1(2007)。

C.E.P.S.

中共的援助口惠實不至，美國對中華民國則是「全力相挺」。這些論點都說明在金門事件上毛澤東是個「現實主義者」。金門事件若跟大躍進有所關聯，特別是從意識型態著手的分析，需要更多令人信服的證據。80 年代以來，新解釋重新檢視大躍進衝擊中蘇關係的過程。毛澤東的「思考」與「行動」之間的圖像日漸清晰。

本文認為，1958 到 1960 年代的中蘇關係，可以從下面幾個面向來理解。第一，兩國發展模式的差異。毛澤東發動大躍進；赫魯雪夫雖然微調經濟政策，依然是史達林模式的支持者。第二，在國際關係與國家安全上，蘇共二十大提出「三和路線」，和美國關係逐漸和緩；毛澤東則在莫斯科會議提出「東風壓倒西風」，並在 1958 年未事先知會蘇聯的情形下發動金門砲擊。第三，蘇聯始終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中國則在 1840 之後面臨領土瓜分的主權危機。聯合艦隊與長波電台等事件，說明了毛澤東對於主權問題的敏感，蘇聯卻後知後覺。第四，兩國的領導人因素，毛澤東和赫魯雪夫的個性，許多一手的回憶錄指出，都是個性倔強，不願讓步。在社會主義國家外交極度個人化的情形下，領導人之間的互動成為兩國關係友好與否的重要因素。

本文的回顧過程中，美國視角下的「中國研究典範」在中蘇關係中的運用是很有趣的問題。例如「意識型態衝突論」和「極權主義典範」都強調毛澤東的角色。「金門事件分歧說」則和派系政治有所關聯。[43]極權主

[43] Zagoria認為，面對第一個五年計畫產生的問題，中共黨內的激進派與漸進派有了激烈的爭辯，反右運動後，激進派佔了上風，也導致外交政策的激進。參見Donald Zagoria,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1956-1961,*78. Allen

C.E.P.S.

義之下，精英極度團結；派系政治之下，精英可能運用不同的政策爭奪權力。中蘇關係研究是否能從中推敲出一些新穎的論點？新解釋似乎又回到毛澤東中心論的位置。這說明由美國觀點建構下的中蘇分歧研究，特別是「派系政治」的研究途徑，需要更一步的探討與商榷。

Whiting曾經質疑這種過於簡單的分析方式，然而沒有說明替代解釋。參考Allen Whiting，〈中蘇分裂〉，收入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費正清（John K. Fairbank）主編，王建朗等譯，《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445-446。依筆者所見，最重要的問題是，1958到1960中共外交上究竟有無「兩條路線鬥爭」的事實，唯此非本文研究的重心。筆者的另外一篇文章〈中蘇分歧（1958到1960）研究中的內政與外交分析：兼論毛澤東的權力圖像〉針對這個問題有較為深入的探討。參考王瑞婷，〈中蘇分歧（1958到1960）研究中的內政與外交分析：兼論毛澤東的權力圖像〉「中興國際政治所與政治大學東亞所聯合論文發表會」，台中：中興大學國際政治所、政治大學東亞所，2008年12月6日。

C.E.P.S.

參考書目

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13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1998。
2. 孔寒冰，《中蘇關係及其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4。
3. 牛大勇、沈志華主編，《冷戰與中國的周邊關係》，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
4. 王奇編，《二戰後中蘇關係的演變與發展》，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0。
5. 吳玉山，《遠離社會主義》，台北：正中書局，1996。
6. 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
7. 李英明，《中國大陸研究》（台北：五南，1995）。
8. 李英明，《中國研究：實踐與反思》（台北：生智，2006）。
9. 李越然，《中蘇外交親歷記》，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
10.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
11.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北京：春秋出版社／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另一版本爲台北：新銳出版社，1994。
12. 沈志華，〈蘇聯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反應及其結果──關於中蘇分裂緣起的進一步思考〉，《二十一世紀》網路版，12（2003.3）。
13. 沈志華，〈試論中蘇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兼談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結構性弊病〉，《中國冷戰網》，2007年10月22日。
14. 沈志華主編，《中蘇關係史綱》，北京：新華書店，2007。
15. 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C.E.P.S.

16. 孫其明，《中蘇關係始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7. 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
18. 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著，杜蒲、李玉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後毛澤東的中國—人民共和國史》香港：中文大學，2005。
19.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台北：聯經，2001。
20. 陳永發主編，《兩岸分途：冷戰初期的政經發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
21. 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 Farquhar）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22. 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2卷：大躍進1958-1960，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23. 楊奎松，《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台北：東大圖書，1997。
24. 楊奎松，《走向破裂：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25. 楊奎松主編，《冷戰時期的中國對外關係》，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26. 赫魯雪夫，《赫魯雪夫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
27.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事件與決策的回顧》，上、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1993。
28. 謝春濤，《大躍進狂瀾》，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29.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30. 羅平漢，《文革前夜的中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1.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費正清（John K. Fairbank）主編，王建朗等譯，《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32. 關向光、李英明編，《中國研究的多元思考》台北：巨流，2007。
33. 關向光，〈論中共大躍進時期的毛澤東路線〉，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1996。
34. Bachman, David. *Bureaucracy, Economy, and Leadership in China: The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35. Becker, Jasper. *Hungary Ghosts: Mao's Secret Famin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6.
36. Chan, Alfred L. *Mao's Crusades: Politics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China's Great Leap Forwar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37. Ellison, Herbert edited.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82.
38. Gaddis, John.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University Press, 1997.
39. Gitting, John. *Survey Of The Sino-Soviet Dispute 1963-1967*.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1968.
40. Hinton, Harold . *Chinese Policymaking Under Soviet Pressure*. Washington D.C: Standford University, 1971.
41. Hinton, Harold .*Communist China In World Politic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66.
42. Hinton, Harold. *China's Turbulent Ques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1972.
43. Jian, Che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44. Robinson, Thomas. and Shambaugh, David edite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C.E.P.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45. Schurmann, Franz.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r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46. Teiwes, Frederick C. and Warren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Mao, Central Politician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Unfold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5-1959.* Armonk, N.Y.: M.E. Sharpe, 1999.
47. Westad, Odd Arne edited.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5-1963.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48. Zagoria, Donald.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1956-1961.*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C.E.P.S.

Great Leap Forward and its Explanations on Sino-Soviet Relation

Rei-Ting, Wang

（Graduate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NCCU）

The article provides three explanations to Sino-Soviet conflict, and its relation with Great Leap Forward. The first explanation so called "ideology conflict" emphases Mao's unique perspective of Great Leap Forward, which irritated and humiliated Soviet Union. However, little evidence accounts for Soviet Union's response. The Second explanation Taiwan Strait Crisis analyses that Taiwan Strait Crisis is aim to transform domestic tension created by Great Leap Forward, challenged Soviet Union's new foreign policy. Optimistic emotion, instead of tension was among top leader of Chinese Communism Party during Great Leap Forward, nevertheless. Also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 Strait Crisis and Great Leap Forward need further research. The Third explanation focus on Mao's judgments to domestic affairs will affect Chinese foreign policy. Because of Soviet's critics to People Commune, Sino- Soviet relation is no more harmony as1949-1956.The article, first examines content of these explanations. Second, analyses problems behind these explanations. Finally, point out "China Study Paradigm" which dominate China Study sphere in America academics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needed more examinations.

Keywords: Sino-Soviet Conflict, Great Leap Forward, Mao Zedong

C.E.P.S.